

西方著名社会学家思想研究丛书 FAMOUS WESTERN SC



T SERIES

安东尼·吉登斯：

第三条道路

郎友兴 著

丛书主编 冯钢

Anthony Giddens

浙江大学出版社

ANTHONY GIDDENS

安东尼·吉登斯：

第三条道路

郎友兴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郎友兴著.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6
ISBN 7-308-02312-5

I. 安... II. 郎... III. 社会学家-思想评论-英国
IV. C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21586 号

-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浙大路 38 号 邮政编码 310027)
(E-mail:zupress@mail. hz. zj. cn)
- 责任编辑 余健波
- 排 版 浙江大学出版社电脑排版中心
- 印 刷 浙江印刷集团公司
-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 印 张 7.5
- 字 数 178 千字
- 版 印 次 2000 年 6 月第 1 版 200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 印 数 0001—2000
- 书 号 ISBN 7-308-02312-5/C·165
- 定 价 12.00 元

总 序

学术的发展,并不是一个单纯的逻辑过程,并非像一般人们想像的那样是对一个客观实在循序渐进的发现,且不断往其中添加新内容的过程。学术发展,正如熊彼特所说,是我们与自己以及我们前人头脑中创造的东西进行无休止搏斗的过程,每一个进步都是在新思想和新需要的冲击下,受着新一代人的偏好与气质的支配。因此,任何对学术现状的把握实际上都是在把握为历史所规定了的方法、问题和结果,只有对照其所由产生的历史背景来考察才会有意义。换言之,任何时候的任何学术状况,都隐含着它过去的历史背景,如果不了解这种隐含的历史,就不可能真实地表述这种学术状态。

因此,就思想或学术而言,了解其历史最有效的途径,应该说就是认识经典。当然这并不是说经典就构成了思想史或学术史的全部,而是说,经典以最浓缩的形式承载了历史上不同时代人类思想与智慧的积淀和结晶。具体落实到社会学这个领域,结识自这门学科正式诞生以来一个半世纪的历史中的那些新老大师们,体验他们对现实的感受方式,了解他们认识观察其所处社会的视角和方法,熟悉他们的观念和思想,对于今天的社会学学术事业的健康发展,对于今天的社会学者们认识研究其所置身的社会,应该说同样也是大有裨益的,甚至是不可或缺的一个环

节。而这,可以说,正是我们这套丛书的初衷所在。

如果说,社会学的基本宗旨是对人类社会及其运行规则或状况的认识、探索和反省,那么,经典文本(classic text)就是这些新老大师从其特定的立场、问题出发对其所处的特定社会进行认识、探索和反省的结果。因此,就会有这样一个问题:这种从特定的立场、问题出发的对特定社会所作的认识、探索、反省,是如何与我们今天的社会生活相关联的?换言之,那些基于特殊性的文本如何显示出它超越特殊性的意义?这里牵涉到对于文本的两种解读方式。P. Ricoeur 曾对言说话语和书写文本作过一个区分,他认为,言说(speech)是一个事件,而书写下来的不是言说(saying),而是所说(said),因此,通过书写,作者原本的旨意和文本的意义不再完全契合,文本的命运开始独立于作者的生涯,文本也独立于言说的直接指涉。由于文本和言说的这种区别,就产生了对文本的两种不同倾向的解读方式:一种是高度情境化(hypercontextualisation)的解读方式,另一种是去情境化(decontextualisation)的解读方式。前者力图从作者所处的(也即文本所由以产生的)具体社会情景和脉络中来理解把握文本,尽可能将文本还原为作者的言说,从而领会作者的本意;后者则与此相反,解读者倾向于从自身的问题关怀出发,超越文本所产生的具体的、特殊的社会情景和脉络,从中抽象出较具普遍性的、可以移置并洞亮其他社会情境的内在理路。我们认为,第一种解读方式可以驱除由于时间和空间的隔阂而笼罩于文本之上的尘埃迷雾,第二种解读方式则可以使产生于其他时空中的文本联系于当下的现实生活。

当然,需要说明的是,从总的倾向上看,这套丛书的作者所采用的主要是第一种解读方式。原因其实也很简单,第一种解读方式是第二种解读方式的前提和基础;在不理解或误解作者原

旨的情况下即对文本进行普遍性的抽象或直接套用、移植文本中的术语、概念,如此郢书燕说的结果,往往会是张冠李戴、变桔为枳,从而发生怀特海所说的“错置具体感”的谬误。况且,就第二种解读方式而言,它往往受到解读者所关注的具体问题和所由出发的立场的影响。因此,作为这套丛书的作者,在认真完成第一种解读之后,大可以让读者从他们自己的具体感出发进行第二种解读,这样,至少也可以使我们免除越俎代庖之嫌。

西方著名社会学家思想研究丛书

丛书主编 冯钢

FAMOUS WESTERN SOCIOLOGIST SERIES

浙江大学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章 生平、著述与时代、思想背景	(1)
第二章 非(反)实证主义与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	
(对社会研究方法论综合的一次努力)	(11)
一、拒斥自然主义与实证主义	(11)
二、对现象学社会学的分析与批评	(14)
三、本土方法论的局限性	(18)
四、对结构主义的批判	(20)
五、综合的一次努力	(24)
第三章 社会之构成:结构化理论	(30)
一、结构化理论的中心论题	(30)
二、行动与行动者	(33)
三、结构与结构化	(38)
四、制度与社会系统	(55)
五、社会实践与行动	(68)
第四章 国家、社会与全球社会变迁历程	(76)
一、社会转型与全球社会变迁分析框架	(76)
二、传统国家及其特征	(88)
三、从传统走向现代:作为过渡类型的绝对主义国家	
.....	(100)
四、资本主义、工业主义与现代民族—国家	(106)

五、全球国家体系与民族—国家	(124)
第五章 现代性及其结果	(139)
一、断裂与现代性的基本特征	(142)
二、社会学与现代性	(146)
三、现代性与时间、空间及脱出机制	(149)
四、现代社会的制度性维度与全球化	(157)
五、现代性下的信任与风险	(172)
六、现代性的后果与当代的社会运动	(186)
七、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	(192)
第六章 代结语：超越左与右的第三条道路	(207)
一、简要的评析	(207)
二、超越左派与右派的第三条道路	(215)
附 录 吉登斯教授著作目录	(223)
后 记	(227)

第一章 生平、著述与时代、思想背景

与 20 世纪 60 年代的危机意识相对立的是,80 年代以来西方社会学理论出现了普遍追求稳定的思想倾向,出现了多种试图对现有理论、学派进行综合的方案。^① 在这些方案中,英国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社会理论是其中典型的一种。这位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的院长可谓是当今西方社会学界炙手可热的人物,在英语世界的社会学领域里毫无疑问是一个领袖级的人物。

1938 年 1 月,吉登斯出生于英国北部的埃德蒙顿,在南门(Southgate)的明春屯(Minchenden)学校完成其初等教育。进入赫尔(Hull)大学后,他打算主要攻读英文,但是被拒绝,因此转而研习哲学。可他发现学校里面开设的哲学课程中有意思的不多,于是再次改学社会学与心理学,这样社会学界又多了一位未来成为大师级人物的学生。吉登斯于 1959 年毕业,其成绩十分优秀,随之到伦敦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攻读硕士学位。1964 年,吉登斯开始了他在英国的莱斯特(Leicester)大学任社会学讲师的教书生涯,最初给三年级学生

^① 参阅苏国勋编的《当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第十卷·社会哲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 年,第 20—39 页。

讲授社会心理学。1966年至1968年，他在加拿大的西蒙·弗雷泽(Simon Fraser)大学任教，随后(1968—1969)以访问助理教授身份到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讲学。1969年，他受聘于英国剑桥(Cambridge)大学，成为该校国王学院的讲师和研究员。1976年，吉登斯在剑桥获得博士学位。1984年至1985年任剑桥大学社会学副教授(Reader)，1986年以后任教授。当然，他是不断地穿梭于世界各地的，在北美、欧洲、澳大利亚等国讲学，是世界上不少著名高等学府的访问教授。此外，吉登斯还是Polity出版社及社会研究中心的主席，是公共政策研究所的评议员(Trustee)，莱斯特大学董事会成员。现在，他已是世界著名的高等学府——伦敦经济学院——的院长了。^①

吉登斯著述丰富，现已发表了200多篇文章，出版了几十本著作，其中有些已被译成外文，达22种文字之多。1971年与1972年，吉登斯分别出版了《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Capitalism and Modern Social Theory, 1971)与《迪尔凯姆》(Emile Durkheim, 1972)，书中分析了马克思、迪尔凯姆、韦伯等人的思想。这两本著作被认为是了解西方古典社会学三大传统不可或缺入门之书，是他批判性地研究社会理论尤其是欧洲思想传统的初步成就。1973年出版的《发达社会的阶级结构》(The Class Structure of the Advanced Societies, 1973)是他首部以当代社会生活为内容的著作。颇引人瞩目的是，该书中首次出现了“结构化”(Structuration)的概念，由此展开了他的著名的结构化理论研究。吉登斯正式提出既使他饮誉学术界与思想界而又带来非议的结构化理论的，是1976年出版的《社会学方法新规则》(New Rules of Sociological Method, 1976)。尔后发表的

^① 根据吉登斯本人所提供的履历而写。

《社会理论的中心问题》(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1979)除了继续阐述他的结构化理论外,一个突出之处在于首次将时间—空间视为社会科学的中心概念。1981年和1985年,吉登斯分别出版了《权力、财产与国家》(A Contemporary 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ol. 1: Power, Property and the State, 1981)、《民族国家与暴力》(A Contemporary 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ol. 2: The Nation State and Violence, 1985),这是运用结构化理论分析、研究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两本著作。被公认为系统表达他的结构化理论的是1984年出版的《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大纲》(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1984)。随着西方学术界与思想界对现代性、后现代性问题的关注,吉登斯以其敏锐的目光运用结构化的理论对此作了独特的分析与研究,由此成为一位以探讨现代性、后现代性、现代社会变迁问题著称的社会思想家。1990年以来,他先后出版了《现代性之结果》(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1990)、《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1991)、《亲密关系的转变》(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imacy, 1992)、《生活在后传统社会之中》(Living in a Post-traditional Society, 1994)、《超越左与右》(Beyond Left and Right)、《反思性的现代化》(Reflexive Modernization)等著作,分析了现代性及其相关的问题。

除了以上这些之外,吉登斯还有不少有关现代社会政治理论方面的著述,并出版了一些颇有影响的论文集。他主编的社会学教材在西方很有影响。1989年和1992年他分别出版了供英美国国家使用的社会学教材《社会学》和与此相匹配的《社会学原著选读》,其中《社会学》一书已出了好几版,是英语国家中主要的社会学教材之一,在大学中被广泛地采用。

吉登斯的理论思想既是时代发展尤其是学术思想发展的产物,亦有其思想渊源。正如科林伍德所说的,“‘科学知识’无不含有历史的因素”。对此马克思主义有不少经典的论述,“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和精神的的历史的基础”,^①“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过程”。^②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和现代性思想当然有其产生的背景:其一是60年代西方社会理论危机以来西方学术界与理论界追求稳定的一种要求与反映;其二,现代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变化促使西方社会理论家们不得不重新思考他们原有的理论,对现代社会尤其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反省与批判性的分析。

社会现象是各门社会科学共同研究的主题,只不过它们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现象的不同维度。尽管研究维度不同,却都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理论问题,这就是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与认识论问题。其中一个方面的问题就是整体与部分、社会与个体的关系,“即社会是可以化约的抑或是不可化约的?”^③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四种基本的倾向。第一种是迪尔凯姆所开创的“社会学主义”。迪尔凯姆提出应该从整体上研究社会,而社会整体是不能化约为各组成部分之和的。因此,他强调首先要分析的是系统整体,并将系统的组成部分看作是能够带来确定的常态并能满足系统条件的东西,因为整体优于部分。他提出任何一种社会事实都应被看成客观实在的社会事实,“首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2、3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2、30页。

③ 参阅苏国勋编的《当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第十卷·社会哲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6页。

要的和最基本的规程是将社会事实认作为事物”，^①因为社会事实具有独立于人的客观性、普遍性和对人的行为的某种强制性。

在迪尔凯姆看来，“社会事实范畴具有十分明显的特征：它是由活动、思想和情感方式组成，它外在于个人制约个人，因而体现为一种强制性力量”，^②因此只能从整个社会生活的背景上去综合研究社会，而“社会学这门科学只有在认识到把社会事实当作实在的物来研究时才能诞生”。^③在社会理论中，将这种从整个社会生活背景上去综合考察社会环境的观点称之为“社会学主义”(sociologism)。这种整体观最终的着落点是群体，而不是个人、个体。这是一种社会实在论。各种形式的结构主义、功能主义都可以归为这一类。第二种是以德国社会学家G·齐美尔(Georg Simmel)为代表的社会唯名论。在齐美尔看来，社会是人们彼此之间不断相互作用也就是由互动的关系网络所构成的，“社会无非是由相互作用联结起来的大量人群的名称”。^④因此，对于社会研究来说，应该把重心放在人们的交往之上，而不是结构之上。他的思想被称为“形式社会学”(formal sociology)。这种社会唯名论又称为社会原子论。第三种是以韦伯的“理解社会学”与卡尔·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为代表的“方法论个体主义”。韦伯企图通过对个体行动者主观意义的理解达到对整体社会现象的因果性说明，“社会学是一门科学，其意图在于对社会行动进行诠释性的理解，并从而对社会行动的

① 迪尔凯姆，《社会学研究方法论》，胡伟译，华夏出版社，1988年，第11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参阅苏国勋编的《当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第十卷·社会哲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7页。

过程及结果予以因果性的解释”。^① 韦伯的目的在于将整体/个体的二元对立调和起来。相比较而言,波普尔的观点是非常激进的。他反对社会科学中的唯实论与整体论思想,主张社会科学要以个人为其研究对象,“社会理论的任务是要仔细地用描述性的或唯名论的词语建立和分析社会学模式(models),这就是说,依据每个人以及他们的态度、期望、关系等情况来建立和分析社会学模式——这个设定可以称为方法论的个体主义”。^② 所以,“对社会整体或集体之经验存在的信仰(可以被描述为朴素的集体主义)必须让于这样的要求:社会现象,包括群体,应按照个体及其活动与关系来加以分析”。^③ 波普尔将社会学中的实在论与整体论称为“方法论的本质论”(methodological essentialism),它与“方法论的个体主义”是相对立的。在他看来,当今的自然科学已经普遍地接受了“方法论的个体主义”,可是社会科学的不少问题却依然沿用“本质论”的方法来处理,这表现为各种历史主义思想的风行。第四种是社会生物主义的方法论。这是一种将生物进化论原则应用到社会科学研究,企图以此来说明社会生活状况的方法论。它承认社会系统是具有自身特殊性的,但是,社会行为与生物行为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在解释人类行为中经常出现的一些基本和普遍行为时,不能忽视生物学,尤其是遗传学的作用”。从19世纪英国的斯宾塞到20世纪60、70年代美国的威尔逊,不少学者将社会行为还原为生物学中的遗传密码,

① 参阅苏国勋编的《当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 第十卷 社会哲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9页。

② 卡尔·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杜汝楫、邱仁宗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108页。

③ 卡尔·波普尔,《猜想与反驳》,傅季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第487页。

或化学或物理或是信息的过程。不可否认的是,社会生物主义的方法论对 20 世纪社会科学的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社会科学的方法论、认识论还涉及到社会科学的说明或理解问题。对此形成了不同的观点,这其中出现了两种基本的取向,那就是实证主义取向与非(反)实证主义取向。

20 世纪西方社会理论一直没有解决社会科学的方法论问题,因而引起了战后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危机。危机来源于对帕森斯理论的批判。结构功能主义自战后至 60 年代在西方社会学界得到广泛的传播,当时有关社会结构、社会分层、社会变迁与现代化研究大多是按照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析模式来进行的,因而在某种意义上说,“结构功能分析”就是社会学研究。可是到了 60 年代,发展中国家的现实与美国国内的反战及各种学潮等社会动荡,促使人们对原先的现代化模式进行重新认识、思考与修正,这在理论上就表现为对结构功能主义的重新评价。在批判帕森斯理论的思潮中,有两个最为典型:一是左派激进主义思潮,如美国的米尔斯、古尔德纳与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另一个是以舒茨为代表的现象学社会学。经过激进主义的批判,西方社会学理论陷入了危机之中。尽管在批判帕森斯的理论过程中,西方社会学出现了多元理论并存的态势,打破了多年来实证主义的一统局面,扩展了对社会认识的广度和深度,但是与此同时对同一个社会现象由于不同的研究取向与分析前提出现了完全不同的研究结论,在理论和思想观点等方面产生冲突与对立。这种分歧实际上表明在社会科学体系中缺乏一般性理论,因而具有不成熟的性质。此外,危机不断是当时西方社会矛盾与冲突的反映。60 年代西方国家出现了许多有组织的大规模的反社会运动,这些运动构成了对现在的社会结构与政治结构、社会制度与价值观念的稳定性的挑战。有些运动是成功的,但不少运动仍然

没有能够改变已有的行为与思维方式。但是,重要的是当代的社会理论不仅不能预测这些事件,更无法解释这些社会现象。当代不少社会学家比如古尔德纳(Alvin Gouldner,1970)提到过社会理论的“危机”,但是吉登斯所作的学术探讨是重要的开端。在其1971年出版的《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第一版的“前言”中提到过这个危机:“这本书是出于这样的信念而写的:当代社会理论需要一个根本性的重建。这种重建必须从重新认识这些著作家们的著作开始,他们建立了现代社会学的基本框架。在这些著作家中最为重要的是马克思、迪尔凯姆与韦伯。”

然而,自8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学理论出现了普遍追求“稳定”的思想倾向,这与60年代的危机意识形成鲜明的对照。为了克服理论与方法论的危机现状,不少社会学家企图通过回到古典社会学思想遗产,吸取营养,对当代社会学理论进行综合,以解除危机。这一发展过程主要表现在“韦伯复兴”运动和以世界各地的“韦伯热”为代表的重新研究古典社会学理论、重新评估帕森斯的理论的潮流。“正是在这种重新评估帕森斯理论,强调社会学理论本质应具有多维性、整合性和系统性的背景下,80年代后出现了各种试图对现有理论、学派实行综合的方案”。^①“在80年代出现的各种发展与以往任何一个时代出现的发展大不相同,因为有一批涉猎范围甚广的理论家离开了理论上的极端主义,开始在具体的微观—宏观领域为实现综合而奋斗”,“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就各种分析层面而言,到了80年代,理论家们都已经厌倦了这种微观与宏观的分裂”。因而,“微观—宏观的综合似乎从来就是为人们广泛地安排各种综合努力铺平道路的

^① 参阅苏国勋编的《当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第十卷·社会哲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0—39页。